

邵容与陈天华的思想

陈旭麓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鄒容与陈天華的思想

陈旭麓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鄒容和陈天華是辛亥革命前期思想战綫上的两个代表人物，他們在資產階級开始領導民主革命运动时，所起的作用很大。本書系根据他們的著作和活动，对他們的思想發展加以分析和評論，对他們的思想的时代局限性，也有所解釋和批判。

鄒容与陈天華的思想

陈 旭 麓 著

*

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紹 興 路 51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号

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1/32 印張 2 字數 37,000

1957年 2 月第 1 版

1957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

統一書号：11074·89

定 价：(7) 0.19 元

目 錄

序 言	1
鄒容的“革命軍”及其思想	3
一 鄒容奮鬥的年代	3
二 “革命軍”的民主主義革命思想	15
三 “革命軍”與“蘇報案”	27
四 “革命軍”與辛亥革命的關係	32
論陳天華的愛國民主思想	37
一 民主革命的傑出宣傳家	37
二 強烈的反帝愛國思想	40
三 從愛國到反君主專制的民主革命思想	47
四 陳天華思想的特點及其局限性	56

序 言

过去的史書和史論，有“合傳”和“合論”的体裁，我將介紹鄒容和陳天華的兩篇文章放在一起，也有这样的意义。

五十多年前的中國，处于新旧交替的激变階段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后，开始以新的面貌代替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改良运动和旧式的農民战争。鄒容和陳天華是这个激变时代的青年知識分子，他們向西方尋找真理，他們热爱祖國，他們不避艱險，終于为奔走國事而死，表現了純潔的革命品質。死时一个才二十一歲，一个也只三十一歲，人們哀为“國殤”，曾激起了对清朝統治者更深的仇恨。

鄒容和陳天華的思想行动，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初期，具有鮮明的战斗性，他們不僅是較早的民主革命活动分子，也同样是民主革命的先進思想者。無論鄒容的革命軍也好，陳天華的警世鐘、猛回头等論著也好，都充滿着愛國感情和不可屈服的革命意志，是辛亥革命时期犀利的思想武器。他們对民主革命的認識虽然有局限性，还没有將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結合得很好，但是鄒容的反清反封建專制的民主主張，陳天華的坚决反帝态度，在狠狠地鞭打着一个敌人的时候，客觀上也就不能不鞭打到另一个敌人。所以他們已意識到中華民族的解放，是和帝國主义、封建主义兩大勢力不能并存的。鄒容

曾宣稱要與“愛新覺羅氏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中”，然後再掃蕩干涉中國“主權之外來惡魔”。當然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不可分割的關係，以及中國民主革命的客觀規律，他們是不能理解或不能深刻理解的。然而他們의思想和鬥爭，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，既表達了中華民族的覺醒，也喚起了中華民族前進，儘管他們的政治思想還不是十分成熟，但這却仍然是我們值得珍視的一份遺產。

1928年，上海民智書局印行的革命文庫（是有关旧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著）中，有革命軍和陳天華集兩個單行本，現在已很難找到。而且陳天華集遺漏甚多，如最近政見之評決、國民必讀、最後之方針等論著，均不見於集內，即有名的警世鐘，也未編入。如能整理重印，對發揚愛國主義思想或研究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和思想史，均為有益。

1956年9月23日

作者于華東師範大學

鄒容的“革命軍”及其思想

一 鄒容奮鬥的年代

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，中國人民展開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，給封建專制制度敲起了喪鐘。當時的許多知識青年，是這一時代的觸角，他們以思想言論影響社會，鼓吹革命，如鄒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。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，鄒容在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，勇往直前，具有極大的衝擊力。這不僅表現於他的惟一論著——革命軍中，為了實現革命軍的理想，他還貢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。

鄒容字威丹，四川巴縣人，重慶現在還有紀念他的鄒容路。他生於鴉片戰爭四十餘年後的1885年（光緒十一年），這一年是法國殖民主義者挑起了中法戰爭的第二年，也是中法戰爭結束的一年。中法戰爭的結果，法國殖民主義者并吞了中國的近鄰——越南，資本主義各國的侵略勢力，並從政治、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涌入中國，它們在中國的半殖民地統治秩序，已在逐步形成。過十年，又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1894年（光緒二十年）的中日戰爭，日本不僅強占了中國的神聖領土台灣、完成對朝鮮的殖民統治，而且通過馬關條約，更可以“合法”地任意掠奪中國的原料和勞動力，在中國的土地上建立它們的工廠，大大的便利了它們的資本輸出，正如當時譚嗣同對

清政府的指責說：“及睦和議條款，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，一舉而棄之。”^①各帝國主義國家緊接着這些侵略戰爭之後，就在中國進行獨占性的侵略，租借臺灣和划分勢力範圍，以致“日本議院日日會議，萬國報紙沸騰，咸以瓜分中國為言”^②。面臨着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，中國人民展開了救亡運動。繼太平天國反封建反侵略的鬥爭後，出現了新的革命高潮，即1898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的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，特別是1900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農民階級的反帝鬥爭，前者促進了中國的民主運動，後者打擊了帝國主義的瓜分陰謀，但都歸失敗。腐敗透頂的清政府，對帝國主義的態度是“若謠傳烽火逼長安，便一片降幡出石頭”^③；對中國人民却是刀子和絞架，“非迫民以威，即陷民以律”^④。鄒容生長於這個時代中，當然有極大的苦悶，但這個時代也給予他以奮鬥的環境。

至於鄒容生長的故鄉、號稱“天府之國”的四川，雖然還不是帝國主義的武裝直接逞凶的地區，但作為侵略先鋒的傳教士，天主教的勢力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已出沒於這裡，基督教也在1868年（同治七年）進入了四川，所以早期的改良主義者馮桂芬說：外人“年來徧繪地圖，輒迹及乎滇、黔、川、陝，其意何居”^⑤！特別是1876年（光緒二年）簽訂的烟台條約，規定

① 譚嗣同全集，三聯書店版，頁二八八。

② 中國史學會：戊戌變法，第二冊，神州國光社版，頁一八八。

③ 江蘇，第六期（1903年8月出刊），革命軍傳奇。

④ 劉申叔：左龔外集，卷一四，普告漢人。

⑤ 馮桂芬：校邠廬抗議，善馭夷議。

“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旅，查看川省英商事宜”^①。還有專款一條，規定英國可派員由北京動身，遍歷甘肅、青海一帶，或由四川等處入西藏抵印度。外國資本主義自此便公開將位於長江上游的四川，列入它們的侵略日程。及馬關條約簽訂，重慶又被指定為通商口岸，至此帝國主義分子“來川游歷者日多”，肆行間諜活動。英商且於1898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“自制輪船一艘，安抵重慶，并無阻礙”^②。所以造成“洋貨充物，紗布糖油入中國，沿江上溯，土物不能抵制，利益于外”^③。同時封建剝削也日趨嚴重，“川省津貼捐輸，歲納百數十萬，借撥京協各餉”^④，是四川人民極大的負擔。1876—1886年（光緒二——十二年），充任四川總督的丁寶楨說：“正供（按指田賦——引者）之外，有按糧津貼，計可得六十萬兩；津貼不足則又按糧捐輸，計可得八十余萬兩”，但“率之常年捐輸而仍有一百二三萬兩”不敷，於是官不得已而取之民，民不得已而輸之^⑤。繼丁寶楨任四川總督的劉秉璋於1888年（光緒十四年）奏稱：“川省京協各餉，需用甚巨，請援案再辦按糧津貼”^⑥。1890年（光緒十六年）又奏稱：“查川省鹽價逐漸加

① 黃月波等：中外條約彙編，頁一五，中英條約。

② 昌言報，第一冊（1898年出刊），頁一三。

③ 涪陵縣重修縣志，卷一八。

④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，卷三〇七，頁六。

⑤ 丁文誠公奏稿，卷一三。

⑥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，卷二六二，頁九。

漲，每斤以至五十六文，民力商情，均形疲困。”^①但在這些所謂正供和津貼捐輸之外，還有不見于統治者章奏的壓榨，即“各該省卡局稅項，官吏隱匿入己，為數甚巨，弊端百出，盡飽私囊”^②。到帝國主義結伙進犯的八國聯軍之役，清政府和各帝國主義者簽訂了使中國損失極其巨大的辛丑條約，單賠款一項就是四億五千萬兩，分三十九年攤還，年息四厘，本利總額近十萬萬兩。清政府為償付這筆巨額賠款，勒令各省每年担負二千三百零五萬零三百兩，四川每年要分攤二百六十一萬八千兩，因此在正供、津貼、捐輸、官吏壓榨之外，又加上了各帝國主義者的沉重勒索。

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對中國人民這種無止境的壓取，陷中國社會于殘破不堪的境地，四川早已是“民力商情，均甚疲敝”，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之役以後，更形嚴重。這些事實，促使社會矛盾激化，作為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壓迫的會黨組織，遂充斥于四川。四川總督丁寶楨早就嚷着要“嚴拿囑匪鹽梟”^③，護理總督游開智（繼丁寶楨任川督的劉秉璋未到任前，由游開智護理）則慌奏：“匪黨劫獄焚署”^④，遠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也說：“四川民情浮動，最易滋事，重慶民教仇怨本深。”^⑤為什麼“民教”會“仇怨本深”？正是由於帝國主義分

①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，卷二八二，頁七。

② 同上書，卷二八四，頁五。

③ 清史列傳，卷五四。

④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，卷二三一，頁一一。

⑤ 同上書，卷二二九，頁九。

子的窮凶極惡，和清朝官吏的護教抑民所造成的，所以“民之受屈愈甚，則銜恨愈深，而教會之案迭起矣”^①。自十九世紀六、七十年代起，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的反教會鬥爭，遂遍及全國。以四川來看，從1863年（同治二年）的重慶教案開始，較著名的教案有：1873年（同治十二年）的巴中教案，1874年（同治十三年）的黔江教案和南充教案，1875年（光緒元年）的榮山、內江等地教案，1876年（光緒二年）的江北教案和涪陵教案，1885年（光緒十一年）的重慶教案，1895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的成都教案。到1898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，就在四川東部的大足、榮昌等地，爆發了以余棟臣為首的大規模反帝鬥爭，傳檄各地，宣布要“驅異族之犬羊”。1900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興起，更震動了全中國和世界。這時鄒容已是一個頗解世事的少年，這幅景象展現在他的眼前，有刺激，也有鼓舞。他的論著——革命軍中，說到“殺一教士而割地賠款，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劄問”，即是上述事實的反映。

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，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已在初步發展中，不僅江浙的紡織業已開始建立基礎，長江上游的四川，也“已購機創設煤油并議立洋蠟公司”^②。與這些新式企業出現的同時，沿海沿江的重要都市，陸續出現了傳播維新思想的書報。1895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，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主辦中外紀聞，上海強學會發行強學報；1896年（光緒二十二年），汪康

① 鄭觀應：盛世危言，傳教。

② 張文襄公全集，卷四五。

年、梁啟超、黃遵憲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（後改名昌言報）；1897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，嚴復在天津主辦國聞報，徐勤等在澳門編印知新報，長沙校經書院發行湘報和湘學新報，宋恕章炳麟于杭州創刊經世報，上海還有實學報、蒙學報、農學報等刊物的發行。就在這一年，四川也由改良主義者宋育仁主辦了渝報和蜀學報。這些宣傳維新變法、主張學習西方的刊物，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風尚，打開了知識分子的眼界。這時倡導民主主義革命的興中會雖然已經成立，但改良主義的維新變法是政治思潮的主流，而且革命與改良的分野，還沒有為人們所認識，一般都稱維新黨，以與頑固保守思想對立。當維新變法這一思潮發展為具有全國意義的政治運動時，鄒容的思想已大為激動，然而使他激動的，不是戊戌政變死難“六君子”中的四川人楊銳和劉光第，而是主張流血變法、慷慨就義的譚嗣同。譚嗣同死後，鄒容懸其遺像于座側，並題詩表示對他的景仰：

赫赫譚君故，湖湘志氣衰！

惟冀後來者，繼起志勿灰。^①

在封建淫威和舊傳統的包圍下，這種表示，具有極大的反抗性，恰與譚嗣同“衝決羅網”的精神一致。

1898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戊戌政變後，越過維新變法的浪頭，人們已憬悟到改良主義的道路走不通，開始有較多的人想尋找新的救國途徑，於是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革命思想，就具

① 鄒魯：中國國民黨史稿，第四編，列傳。

有更大的现实性和战斗性。这种思想，通过書刊，自國外向國內傳播。如1900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，留日学生在东京發刊的譯學彙編，譯載盧騷的民約論、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、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等名著；1901年（光緒二十七年），留日学生在东京發刊的國民報（月刊）第二期，刊有孟德斯鳩之論支那、孟德斯鳩學說兩文；隨着民約論、自由原論均有單行本印行；1902年（光緒二十八年），新民叢報也刊載了梁啟超的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、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。嚴復譯述的法意也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，他并在所作孟德斯鳩列傳中引福祿特爾對法意一書的評價說：“人類身勞，失之久矣，得此而後光復。”①當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，這些社會政治學說，曾經發揮了先導的作用，現在經過譯述，給中國思想界貫注了新的血液。所以1899—1901年（光緒二十五——二十七年），魯迅先生在南京的路礦學堂學習時，“學校看新書的風氣也流行起來，魯迅先生在當時也便花五百文買了一部白紙石印的天演論……學校又設了個閱報處，時務報、譯學彙編在這裡都可以任人閱看了。”②清政府視民主自由思想如“洪水猛獸”，當時有應經濟特科考試者，只因文卷有“盧騷二字而除名”③。可是他們的壓制，終于阻擋不了民主自由思潮的沖擊。鄒容在革命軍內說：“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騷民約論，孟德斯鳩萬

① 孟德斯鳩法意，商務印書館版，頁二。

② 王治秋：民元前的魯迅先生，峨嵋出版社版，頁五八——五九。

③ 國民日報彙編，第一集，短批評。

法精理，穆勒約翰自由之理，法國革命史，美國獨立檄文等書，譯而讀之也。”

由于现实社会的刺激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，鄒容很快地把自己鍛煉成一个为爭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战士，他反抗家庭，反抗社会，反抗一切旧傳統。

鄒容早在十二歲时，即已誦九經史漢等書。他的父親是一个經商隴蜀間（一說經商往來滬漢間）、頗富資財的商業資本家，由于看到鄒容有过人的智慧，希望培养他成为“顯親揚名”的科第中人。可是出于意外的，鄒容已經不是一个願受封建束縛的旧时代青年，他曾向他的父親表示：“臭八股，兒不願學，滿場，兒不受入，衰世科名，得之又有何用！”^①即已流露了反滿反封建的感情。1898年（光緒二十四年）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成田安輝、井戶川辰三先后來到重慶，他們以教授英、日語为深入中國社会的階梯，执行侵略政策。鄒容在亟欲向世界尋求知識的願望下，跟他們學習外國語，得“習聞歐理緒余”，开始吸收新的思想。及他就学于成都时，每与人談論，則“薄堯舜，非周孔，無所避”^②，因而为塾师斥退。可以看出，他这时的思想言行，已与封建傳統發生了裂痕，这种裂痕是新旧思想日益冲突的表征。

义和团运动后，清政府在举國求新的压力下，为了掩飾他們的守旧反动，宣称要举办“新政”。派留学生、办学堂是他們喧嚷“新政”設施的重要項目。1901年（光緒二十七年），四川

①② 鄒魯：中國國民黨史稿，第四編，列傳。

总督奎俊准备派送二十多个青年去日本留学，鄒容参加了这次留日学生的考試，考試的成績并不坏，但由于他平时憤世嫉俗，見忌于权势，官廳竟取消了他的被选資格。鄒容东游的志願甚坚，不因被排斥而灰心，乃轉而作自費留日的打算，經過多次向家庭展开决裂性的爭取，終於得到了他父親的同意。这年秋天，他离开四川，先到上海，入江南制造局所設的外國語補習学校——廣方言館，學習日語。他在廣方言館的时候，不满意那些帶着洋奴思想來學習外國語言的人，作書怀詩以寄慨：

落落何人报大仇？沉沉往事泪長流。

凄凉讀尽支那史，几个男兒非馬牛！

这首詩里，反映了他的愛國思想和与日俱增的憤激感情。1902年（光緒二十八年）春，鄒容由上海去东京，因为他的日文程度和科学知識还不能進入專門学校，乃入同文書院補習，作升学的准备。他在革命軍自序中說：“居于蜀十有六年，以辛丑（1901年）出揚子江，旅上海；以壬寅（1902年）游海外，留学經年。”这几句話且概括了他那簡短的經歷。

鄒容到日本时，中國留日学生已迅速增加至数千人，愛國革命活动，通过这批青年，就在國外活躍起來。如1902年（光緒二十八年）他們筹备举办“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会”（以1644年滿族入关、明朝滅亡为紀念），因清政府的干涉，紀念会虽然沒有开成，却以此为基础，成立了以“民族主义为宗旨”的愛國团体——青年会。1903年（光緒二十九年），留日学生會館举行新年团拜，与会者达千余人，热烈演說，咸發表不推翻清政府的專制統治不能救中國的革命議論。鄒容在这种

日益增長的革命氣氛中，迅速地走上了實際鬥爭的行列。原來，當1900年（光緒二十六年）帝國主義結伙進犯中國時，帝俄一面參加帝國主義的聯合行動，一面又乘機單獨出兵占據東三省。由於帝國主義之間侵略利益的矛盾，辛丑條約簽訂後，英、日帝國主義相繼干涉帝俄在東三省的獨占性行動，清政府得與帝俄締結滿洲撤兵條約。約中規定俄兵分三期撤退，帝俄第一期如約履行，但到第二期（1903年4月），竟延不撤兵，企圖長據東三省，建立“黃色俄羅斯”，并向清政府提出要求，將簽訂新款。國人聞而大憤，展開了拒俄運動，留日學生發起拒俄大會於東京，組織“拒俄義勇隊”，推留學陸軍士官學校學生藍天蔚為總教官，派代表歸國請願。鄒容為拒俄大會發起人之一，加入義勇隊為隊員，逐日從眾操練。清政府以義勇隊“名為拒俄，實則革命”為言，轉請日本政府勒令解散。留日學生的愛國民主鬥爭，不但不因此稍挫，且繼續向前推進。鄒容此後在留日學生界的各種愛國革命活動中，成為最年輕的急進分子，每會必赴，赴必慷慨陳詞，益以激勵同志為己任。

當時留學界的愛國革命活動，還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醞釀的初期，主要的活動方式，是開會演說和發行書刊。所以魯迅先生回憶那時的情況說：“凡留學生一到日本，急於要求的大抵是新智識，除學習日文，準備進專門學校之外，就赴會館（按指留學生會館——引者），跑書店，往集會，听演講。”①鄒容在參預這些活動中，進而想揭露滿洲貴族的專制橫暴，并

① 魯迅全集，卷六，頁五五六——五五七。

喚起國人的覺醒，擴大民主革命運動。他開始參照法國革命、美國獨立的自由平等學說，結合中國所處的環境，着手寫一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，即後來發生極大影響的革命軍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清政府的留日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，與某留學生監督的小老婆發生了奸私情事，他本來是留學界開展愛國革命活動的敵人，現在更引起了大家的反感。鄒容乃出其平日疾惡如仇的義俠行為，與幾個留學生一起直入姚寓責稱：“縱饒汝頭，不饒汝辮髮。”遂截其辮髮懸于留學生會館以示眾，後來章炳麟在獄中贈給鄒容的詩，有“快剪刀除辮”句，即指這一故事。當然這事不是玩世不恭的惡作劇，而是具有反封建意義的政治鬥爭。所以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聞悉後，不僅感到“物傷其類”，也痛心這種“犯上作亂”的行為，亟照會日本外務省，要向同文館執索鄒容，得而甘心。因朋友們的勸告，鄒容乃離日返國。

先是章炳麟蔡元培等，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于上海，想從文化教育方面，傳播革新社會的進步思想。正籌劃間，清政府借口留日學生的言行越軌，多方阻止他們在國外就學，所以赴日青年陸續發生失學回國的問題。同時上海南洋公學、南京陸師學堂因校方控制學生言論自由，相繼發生學潮，學生多人被迫退學。剛成立的中國教育會，乃為這批失學青年設立愛國學社，署名學籍者一百三十二人。愛國學社的師生，本來就是一批具有愛國熱情、而又吸取了新知識的青少年，現在聚集一堂，議論時政，隱然成為東南革命團體。鄒容從日本回到上海，就寄住于愛國學社，與章炳麟因政治思想的接近而建立了友誼。這時在上海的愛國革命人士，以愛國學社的師生為基